

中国短篇小说

不可不读的
20世纪

当代卷

王富仁 方兢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读的
世纪
中国短篇小说

——王富仁 方 兢 主编——

当代卷

1



——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不读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 当代卷. 1 / 王富仁, 方兢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 10 (2008. 12重印)

ISBN 978-7-5604-1338-9

I. 不… II. ①王…②方…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754 号

不可不读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 (当代卷①)

作 者: 王富仁 方 兢 主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97千字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1338-9

定 价: 当代卷 (共五册) 110.00元 本册定价: 22.00元

出版说明

一、本套书精选 20 世纪上起鲁迅的《狂人日记》，下至邱华栋的《公关人》共 166 位作家的 281 篇短篇小说，编为 10 册，按作品发表时间，以 1949 年 10 月为界，分为现代卷和当代卷各 5 册。

二、所有入选作品按作家的生年排序。

三、由于入选作品的时间跨度大，其间汉字屡经改革，鉴于此，对于 1949 年以前的作品中使用的某些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不尽一致之处，如“的、地、得、底”混用，“哪，那”不分，及日期、标点符号、外语中译名等，一般保持原貌，不予改动，以反映原作的旧有风貌。

四、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极为瞩目的成就，其中的名篇佳作甚伙，璀璨如星，但由于这套书篇幅有限，致使许多佳作未遑入选，两位主编已分别在现代卷和当代卷的序言中略为指陈；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还热心自荐另外一些作品为其代表作，要求入选，经主编反复比较和慎重考虑，并与我们仔细研究，原则上仍选用了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作品，请这些作者见谅为感。另外，一些作者寄来了他首肯的版本供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参考，谨此

致谢。

五、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征询入选作品的创作者或其权益继承人的授权，也取得了绝大多数作家或其权益继承人的授权，但仍有部分作品的授权书在本套书付印时未能寄达我社，我们除了向这些作品的作者或权益继承人表示歉意外，也恳请他们在见到此书面世后能拨冗见告，以便我们能及时寄送样书和稿酬。

1998 年 10 月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概览

（代序言）

和王富仁兄联手选编这套《不可不读的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我负责选从 1949 年 10 月始至今的作品。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风起云涌，潮涨潮落，云飞云散，动荡不已。小说，这种最贴近生活的文学样式，也就随着社会的动荡播迁而变化着。1949 年 10 月本是一个政治概念，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治社会，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这时也的确是中国社会性质、特征和状况的分野。当然，各方面的变化并不一定都是在某一天或这一个月里完成的，不过以此来划分文学时代则是适当的。而且赶巧的是，大概算来恰恰是前后各半个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社会，尽管对前半世纪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后半世纪中又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

—

1949 年 10 月起，中国的文学逐步走向高度统一。作者队伍的统一，创作思想的统一，甚至作品主题的统一、题材的统一、内容的统一。对于国家来说，统一当然是好事，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则不然。文学艺术是最需要作家充分发挥和舒展个性的，高度的统一只能产生出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建国后一段时期中所奉行的

文学思想以及依照这些思想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和管理。

概括地说，当时的文学思想就是：文学从属于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必须要写出人的阶级本性来，在表现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揭示社会的本质。这种文学思想达到极端时，要求文学艺术必须为某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提出口号“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如当时身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邵荃麟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的文章，再如《人民日报》曾发表《一个急待表现的主题——镇压反革命》，这些都足以透露出这类信息，而当时这类文章很多，触目皆是。实际上，这时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学，而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在这种文学思想的禁锢中进行创作，很难有好作品能够出世。然而，这种文学思想统治了中国文坛 28 年。

关于近半个世纪当代中国文学的阶段划分，有主张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6 为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反右前；1957~1965 为第二个阶段，是反右后到“文化大革命”前；1966~1976 为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中；1976 年 10 月起，是新时期文学。^① 我认为，上述四阶段中前三个阶段固然有所不同，但究其实质——文学理论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则是完全一样的。在创作方法上，建国初期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唯现实主义独尊，排斥浪漫主义及其他一切创作方法。到 1958 年“大跃进”时，提出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为粉饰现实、伪造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两结合”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大跃进”“浮夸风”的伪理想主义、伪浪漫主义社会思潮，其文学创作的基础，就是“大跃进”中的伪浪漫主义民歌。到“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制定的“三突出”原则，被称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即“突出正面人物，

^① 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第 5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的划分：第一阶段 1949 年 10 月~1957 年 6 月，第二阶段 1957 年 7 月~1966 年 5 月，第三阶段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第四阶段 1976 年 10 月~。分期与上书大同小异，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二十二院校编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这样划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正是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和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要“写本质”这一文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的必然结果。从建国起到“文革”，文学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并逐渐向极端发展的。因而我认为从1949年10月起至1977年10月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所选的这一阶段的作品，多数都在当时遭到过批判。反过来看，为当时文学思想所不容的，恰是有一定艺术性，与政治关系处理得较好的作品。经过历史的沉淀，这部分作品的价值现在就凸现出来了。

这里所选的最早的作品，是萧也牧发表于1950年的《我们夫妇之间》。作品一问世即受到了批判，按照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认为歪曲和丑化了工农干部的形象，通过夫妇之间的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主题，是“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事实上，萧也牧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创作，质朴无华，没有当时高调子和脸谱化的通病。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作品已经够“革命”的了，然而它竟影响了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后半生，以致长期蒙受不白之冤，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被摧残致死。

路翎在40年代就展露出他那出众的文学才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路翎深入朝鲜前线，于1954年初发表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作品一发表就遭到批判，被指责“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歪曲了人民和英雄的形象”。路翎当时写了长达四万字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但无济于事。文艺界对路翎的批判，早在1952年就开始了。到了1955年，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捕入狱，作品也都被定性为“反动作品”和“反革命作品”。这时已不是文学思想的指导和批评，而是政治的粗暴干涉了。路翎本人经历了20年的监狱生活，于1975年被释放，1980年冤案得以平反。这里选了稍短一些的《初雪》，作品洋溢着浓浓诗意，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关怀、热爱和希望，表现得细致、生动，显示出他那种善于表现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文学才能。

1956年至1957年的上半年，是建国初期思想界和文艺界最活跃的

时候。这时有一批勇于突破当时的创作框框和思想樊篱的短篇小说应运问世，一时蔚为大观的景象，给文坛增添了生命的活力。这批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如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署名耿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①，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李国文的《改选》，秦兆阳的《沉默》（署名何又化），李准的《灰色的帆篷》，南丁的《科长》，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龙祥的《入党》、《明镜台》等；另一类是描写爱情的，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在深夜里》，阿章的《寒夜的离别》，刘绍棠的《西苑草》等。作品刚刚发表，这批作者就在随即发起的“反右”斗争中，几乎被一网打尽，大多经受了20年的炼狱生涯。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曾经被称为“毒草”的作品，结集出版，名为《重放的鲜花》。

“干预生活”、“写真实”的作品出现，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一次重大突破，作品一扫无原则的歌功颂德的媚态，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中的一些最敏感的、群众最关心的矛盾，批评了当时出现的官僚主义苗头。按照“反右”时无限上纲的逻辑，批评个别领导干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写真实”的口号也被批判，“干预生活”成了向党进攻的武器。文学理论在这时陷入了自身的逻辑矛盾：文学既要为政治服务，又不能干预生活，不能写真实，那么只有写虚假的大话、空话和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了。这批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文艺界长时间的批判，而是被用“右派分子”的金棍一棍打死。而现在看来，作品所暴露、所批判的问题，真是微不足道的。因这样的小事付出了整整20年的美好年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如此沉重的代价，不仅令人惋惜和痛心，也令人感到有些悲壮。在“干预生活”的作品中，艺术水平最高的当属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时作者仅22岁的年龄，竟能把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世界把握得如此细微和准确。今天看了，仍令人赞叹不已。其他的作

^① 这篇小说原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人民文学》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收入作者文集时，又恢复了原名。

品，都或多或少给人有点粗糙或生硬的感觉。

相比之下，爱情题材的作品写得更好。这也许是由于题材的缘故，容易写得细腻生动，波澜起伏，有人情味。其实这类作品写的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爱情，而是通过写爱情来写新社会的道德和革命的信念。这里选的几篇，作品人物的身分都很有个性，因而更容易编织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动人的矛盾冲突。《在悬崖上》写了一个青年技术员与一个外国姑娘的婚外恋，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小巷深处》写的是一个曾在旧社会受过屈辱、当过妓女的纺织女工，经过了迷惘、曲折、痛苦的爱情历程，获得了幸福。《红豆》则写的是一对青年大学生爱情与革命的冲突，最后终于理智战胜了感情、革命战胜了爱情。这些作品突破了当时不能写人性，不能写人情和爱情生活的禁区，同时用生动感人的情节而不是用干瘪的说教极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然而，这些作品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红豆》被批判为鼓吹超阶级的爱情，宣扬了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

赵树理 1943 创作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轰动文坛，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并开创了山西作家群组成的“山药蛋”派。马烽、西戎都是“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建国后赵树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登记》，是承前启后之作。这篇作品人物性格突出，语言生动，结构完整，故事性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赵树理小说的一贯风格，而且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也描绘得细腻真切。赵树理敢于直面现实社会，并不是一味歌颂，他提倡“问题小说”，从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这同“干预生活”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在 1958 年“大跃进”的伪理想主义、伪浪漫主义的大潮中，赵树理反潮流而行，写了《“锻炼锻炼”》，成功地塑造了好吃懒做、损公肥私的落后妇女形象“小腿疼”和“吃不饱”。作品发表后即引起争论，受到一些文章的批判，遭全盘否定，认为“小腿疼”和“吃不饱”这样的妇女不占农村妇女的大多数；干部应该是党的化身，但小说中写的是一个坏干部。后来在 1962 年的“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总结其为“写中间人物”并予以提倡。不久邵荃麟和赵树理都受到批判。“中间人物论”在“文革”中被列为反动的“黑八论”之一。“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作还有西戎的《赖大嫂》。按照

当时的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能写英雄人物，不能写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这实际上是“三突出”理论之滥觞。

一批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的作家，在建国后用笔来再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和友情。在短篇方面最有成就的是王愿坚，还有峻青、刘真、茹志鹃等人。王愿坚以处女作《党费》蜚声文坛，《七根火柴》达到他艺术的高峰，是革命战争题材中的精品。王愿坚擅长表现革命战争中人性和人情的美好，他的《亲人》写了一位将军把素不相识的烈士的父亲认作自己的父亲，感情真切动人，催人泪下。然而这样的作品却遭到批判，挂上了“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标牌。女作家刘真的《长长的流水》一气呵成，娓娓动听。她的《英雄的乐章》因写了英雄的牺牲，也受到批判。因为按照当时的文学理论，英雄是不能死的。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茹志鹃的《百合花》，海默的《我的引路人》，也都是革命战争题材中的精品。

李准因对土改后农村发生的两极分化趋势感到忧虑和不满，于1953年以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崭露头角，登上文坛。李准是一位关注生活，思想敏锐，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精华，提炼出重大主题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很大。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是大跃进时期创作的《李双双小传》。李准的作品生动活泼，机智有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塑造的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但遗憾之处是过分重视配合政治运动，内容里的政治色彩太重，并带有解释政策的痕迹。所选的《李双双小传》是李准的代表作，这两方面的特点也都很鲜明和突出。王汶石与李准在这两方面都有相近之处。王汶石是一位短篇高手，构思奇巧，手法新颖，代表作在当时被认为是《风雪之夜》、《新认识的伙伴》。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浓重的政治背景，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及政策而写作的。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作品集《风雪之夜》的前言中已有说明。^①与李准一样，他的作品中普遍留下了“大跃进”、“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的印痕。经过历史的沉淀，我以为王汶石最好的短篇是1956年写的《卖菜者》，里面较少有当时政治的印记。在

^① 王汶石《风雪之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前28年中，也许1956年是一个最好的年份。

在前28年中，还有一个好年份，就是1962年。从1961年开始中央调整文艺方针，文学艺术界出现了繁荣景象。由于反右斗争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很多作家如履薄冰，不敢写现实题材，因而写历史题材便蔚然成风。经历了连年的天灾人祸，作家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将人生艰辛的感慨和世事不平的体验寄寓于历史之中。这批作品中写得最好的是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还有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冯至的《白发发生黑丝》。同1956年一样，好年份只有短暂的一年，1963年，全国又掀起了新的政治运动，狠抓阶级斗争。陈翔鹤与黄秋耘的作品，在《人民日报》上被做为毒草点名批判，认为《广陵散》是攻击现实的作品。陈翔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从这时起，极左文艺思潮急剧升温，没有片刻犹豫和缓和，三年以后即达到热昏的程度，这就是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以中央文件下发。^①在这期间，毛泽东几次批示和讲话，对建国以后的文艺界全面否定。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前奏曲。

如果说“文革”前17年的文学的原野上还有几株花木，那么“文革”的10年则成为一片沙漠，所产生的极少量的作品，大都是披着文艺外衣的阴谋政治。较好的短篇，只有蒋子龙在“文革”即将结束的1976年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作品突破了当时公式化的创作模式，惊动了沉寂10年的文坛，但被批为是宣扬了“唯生产力论”的“坏作品”。当然，作品也难免有“文革”的痕迹。这是“文革”中唯一值得入选的短篇小说。

二

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77年11月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开始的。从这时开始，称为“新时期”文学。如果从社会政治的变革来

^①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划分，应该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算起。但文学的变革并没有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迅速到来，而是随着思想的解放缓慢地复苏。

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政治上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因而各种荒谬的观念仍然继续统治着社会，笼罩着文坛，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当时的作品，只不过把以前的批判对象“走资派”换成了“四人帮”，仍然承袭着“文革”的模式，史称“改换文学”。

《班主任》只是第一枝报春花。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个冲击波，也冲开了文坛上极左文艺思潮的防线。到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坛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春天的气象。这仅有一步的路程，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这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新中国的文学，经过了28年的曲折和磨难，直到这时才走上了正路。

随着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思想解放运动，文坛上涌起了连天大潮，汹涌澎湃，各种文学样式争相斗妍，其中最为耀眼夺目的就是短篇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正如茅盾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春满文坛。作家们思想解放，辛勤创作，大胆探索，短篇小说园地欣欣向荣，新作者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建国三十年来，曾未有此盛事。”^①

“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浪潮是“伤痕文学”。这也是当代文学中第一个真正的文学浪潮。一大批优秀短篇小说随着大潮涌现出来，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且每有一篇好作品问世，都在社会上引起一阵轰动，使万千读者争相传阅，激动，落泪。然而在文坛上，每有一篇好作品问世，却往往会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争论。尽管广大读者对这些作品交口称赞，但一些思想还停留在多年前甚至“文革”阶段的批

^① 茅盾《〈小说选刊〉发刊词》，1980年创刊号。

评家，却用极左的批评标准来衡量作品，称为“缺德文学”、“暴露文学”、“感伤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足以说明过去的错误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毒害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有多么深。“伤痕文学”原本是“左派”批评家对这批作品的贬称，而今天竟成了这一文学思潮的名称。历史的大潮是阻挡不住的，社会的变革，思想的解放，使文学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并且按照自身的规律走下去。历史是不会倒退的。

“伤痕文学”蓬勃发展时期当在1978年秋季到1980年。这类作品直面血和泪的残酷人生，揭露和控诉了“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累累伤痕。有影响的短篇除《班主任》、《伤痕》外，还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肖平的《墓场与鲜花》，祝兴义的《抱玉岩》，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郑义的《枫》，甘铁生的《聚会》，等等，不胜枚举。

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的时候，1979年初，茹志鹃揭露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左倾危害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问世，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这就是“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深化和演变，同时也是“伤痕文学”的补充。作家对于单纯的揭露和控诉已不再满足，而是在揭露控诉的同时，反思给中国人民带来这些灾难的原因，追根溯源去寻找历史的轨迹，总结经验教训。在“反思文学”的作品中，理性的思考比“伤痕文学”浓重而深刻，新的题材禁区不断被突破，主题的开拓更加深刻：作品所描述的时间跨度更大，空间广度更宽，事件更错综复杂，人物更多种多样。在“反思文学”中，作家不仅揭露和控诉10年“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而且追溯到“大跃进”，追溯到“反右”，甚至揭露和批判当前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视野也更加开阔，思考也更加深邃，思想也更加解放。这一文学潮流，到了1981年初退潮。其中有代表性的短篇是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宗璞的《我是谁？》，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李国文的《月食》，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等。

当人们都还在控诉和反思过去血淋淋的人生悲剧时，1980年，老作家汪曾祺却写出了远离现实社会生活，没有具体历史背景的《受戒》。

小说写了一个小和尚与农家女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洋溢着美好人情和人性。风格自然、清新、隽永，如行云流水一般，蕴涵着浓重而淡远的诗意的美。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高潮中，写这样的作品，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当时竟受到某些批评家的批评，认为这样的题材没有意义，作品也没有价值。然而，这篇小说还是发表了，这说明中国的文学正在走开放的道路和艺术的道路。第二年，汪曾祺的小说《大淦记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说明了中国文坛的思想和艺术观念正逐渐开放和成熟。《大淦记事》当然是优秀的短篇，然而经过近20年的历史沉淀，公认汪曾祺最好的小说当数《受戒》，堪称传世之作，也是当代短篇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受到社会的结构及状况的制约。在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控制及影响文学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极“左”路线对作家的人身控制，可以任意给作家各种处罚，小到批评警告，大到戴“右派”、“反革命”帽子，直至劳改判刑。这种对人身的最根本的控制。其次是文学理论的指导。文学理论指导作家进行创作，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提炼什么样的主题，怎样塑造人物，安排情节，等等。但这些文学理论都是先验的，并没有经过文学实践的检验。可是作家在创作时却要按照这些理论去写。再次是文学批评的干涉，一篇作品问世，批评家就依照当时的政治、政策和文学理论去评论，是好是坏，是奖是惩，须由管理部门说了算。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任何人也难跳出界外。

社会的巨大变革给文学带来了变革。粉碎“四人帮”后，不再打棍子、扣帽子。思想解放运动越来越深入，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标志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政治上的革新，给作家创造了一个空前自由创作的环境。由于这一大的社会背景的作用，文学理论与政治理论相脱离，由此文学理论丧失了以前的绝对权威性。尽管文学理论没有更新也没有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而发展，但在这时已无关紧要了。因为作家不再理睬文学理论的自说自话，他们完全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来创作，甚至批评家也难以运用原有的理论来观照如此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在以前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是融为一体的，作家在创作时普遍接受

文学理论的指导，作品符合文学理论的要求，则被认定是好作品。“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基本脱节，是中国文坛变革的显著特征之一。文学创作基本上脱离了理论的或批评的束缚，自由地发展了。

当然，这时文学并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文学潮流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人们在揭露和控诉以前的悲惨遭遇时，在反思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残酷的悲剧时，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于是，“改革文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改革文学”的开山作品，是蒋子龙1979年7月的《乔厂长上任记》。作品塑造了一个思想解放、视野开阔、通晓经济规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铁腕人物，表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时人们的愿望和理想。从“反思文学”发展到“改革文学”，是从历史的反思走向了现实的行动，是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社会上万事待举，百废待兴，亟待改革和怎样改革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而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社会上的轰动。“改革文学”的作品不断涌现，当时社会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几乎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作家也都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品有何士光的《乡场上》，王润滋的《内当家》，陆文夫的《围墙》，铁凝的《哦，香雪》。

从文学“新时期”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个文学主潮接着一个文学主潮；一个主潮还没有退，另一个主潮又涌起。优秀的作品随着大潮涌出，接连不断问世，也不断地引起社会上的阵阵轰动。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对社会的影响方面，达到了当代文学近50年来的最高峰。然而，仔细探究起来，文学的轰动效应，其实质并不是文学的轰动，而是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所引起的轰动。读者并不特别留意作品中的文学性、艺术性、技巧性，对语言和叙事方式也不十分苛求，主要是关注作品中的政治倾向和所触及的社会敏感问题。文学的轰动现象是中国特定阶段的国情所造成的。社会学理论表明，一个言论自由度不够和利益表达不充分的国家和社会，如果能给文学更大自由的话，那么民众便可利用文学这条渠道来表达愿望和宣泄情感。当时逐步思想解放、逐步拨乱反正、逐步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这

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因而可以说，文学的轰动效应既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也不是正常的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三个文学主潮退潮后，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建国几十年来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走上正轨，文学的轰动效应就渐渐失去了。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方法上，基本上是复归现实主义。先是突破“文革”时“三突出”造神的创作模式，然后很快突破以前伪现实主义理论的束缚，复归到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忠实于生活，敢于直面现实和人生，敢于揭露和批判社会上的丑陋和罪恶。在这现实主义的主潮中，也出现了主体意识昂扬的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更有些作品采用了各种西方艺术流派和方法，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深的湖》，赵振开的《稿纸上的月亮》，都使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宗璞的《我是谁？》、《蜗居》则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变形艺术；张贤亮的《浪漫的黑炮》吸收了荒诞派的手法。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很多作品都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方法，自由切割组合时空顺序，视角跳跃多变，情节非戏剧化和淡化情节。传统的叙述方式也被打破，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情节的淡化和散文化的笔法写故事，使得小说和散文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有了新的美学风貌。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也在这时被继承和发展了，如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孙犁的《无花果》、《小D》，汪曾祺的《陈小手》等，篇幅短小，采用散文化的结构形式，别有艺术气韵。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塑造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回归大潮中，短篇小说塑造了众多成功的艺术形象，有些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如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惠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陈建功《丹凤眼》中的辛小亮，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中的陈奂生，张贤亮《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徐怀中《西线无战事》中的刘毛妹，王润滋《内当家》中的李秋兰，这些都是真实可感，呼之欲出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

文学题材的扩大和主题的深化，也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重要成就，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建国以后，文学题材一直是一个最大的禁区，只许写反映社会本质的重大题材，不能写日常生活琐事；只许写